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文登状况

(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诞生了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19 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进入迅速发展并对外扩张殖民地的时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但经济落后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一个主要目标。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地加强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农民的负担十分沉重，特别是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和编练新军的大量军费全都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压迫越深，剥削越重，反抗越激烈。1853 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19 世纪末山东人民掀起的义和团运动和 1911 年 10 月的辛亥革命都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特别是辛亥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促进了人民的

觉醒，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但由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其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他们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不敢彻底地发动人民大众起来革命，因而，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历史斗争证明，中国革命既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所能完成的，也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所能完成的。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历史任务，必须要有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必须寻找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伴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步步深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因而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特别困苦，其反抗性和革命性就特别坚决彻底；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特别集中，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三是中国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易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工人阶级的如上特点，表明它一旦得到革命理论的指导，就必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促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极大地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五四”运动中，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了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有出路，一大批共产主义者开始涌现出来。以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克思主义很快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建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虽然成立初期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第二节 文登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文登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以后，日本势力侵入胶东。1895年2月3日，日军侵占威海卫次

日，日军一部侵入文登县北部地区，8日，日军侵入文登城，进城后，日军逐户搜查，捕捉鸡鸭，抢劫钱财，打伤居民两人，居民日夜不得安宁。17日，日军撤离文城。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至此，胶东地区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严重破坏了胶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民生活毫无保障。1899年，英国牧师保乐轩窜来文登，在城东设教堂，借传播基督教，进行殖民统治和文化渗透。

在外受帝国主义压榨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还受着国内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盘剥。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韩复榘、刘珍年等封建军阀，为了争夺胶东地区而发生军阀混战，胶东地区战祸不断，加之匪患四起，水、旱、虫等灾害肆虐横行，同时，官府、军阀横征暴敛，加大了对人民群众的压榨和盘剥，致使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家无宁日，灾难深重。刘珍年还利用农村许多流氓进行恐怖的反动统治，派遣特务监视劳动人民，他们以各种名目捕人勒索。1925年，封建军阀加征了军费，次年，又加征了“讨赤（共产党）”费。1928年，刘珍年在文登设清理官产分处，伪造部照，将城乡学校校产及公有荒山、牧场、会地等强卖殆尽，以饱私囊。国民党贪官污吏更是刮地三尺，他们巧立名目，要捐收税，搜刮民财。什么人口税、房契税、田赋税、牲畜税、卫生附加税等多达20余种，就连挑大粪的苦力也要纳大粪捐，广大劳动人民气愤地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盘剥下，文登人民苦不堪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素有反抗精神的文登人民同国内外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反抗英军强划租界

1898年7月1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签定，威海卫成为英国租借地。专条规定：“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

海全湾沿岸以内之 10 英里地方。”但是 英人借勘划租界之机 肆意扩大租地，遭到文登人民的强烈反抗。1900 年 1 月到 3 月，英人几次埋下的界石均被反抗的群众砸碎。1900 年 4 月 6 日，200 余名英国侵略军前往鹿道口附近的马山嘴，企图以武力勘界，当即遭到千余名手持棍棒和土枪的群众的反抗。英军在鹿道口勘界不成，又转到文登的苟山卧龙村附近埋界石。是日上午，西武林村于冠敬等在道北店村举行千人抗英集会，闻讯后，于冠敬率众奔向卧龙村。在“砸碎鬼子石”的口号中，愤怒的群众抡起锤子、镢头，将刚刚埋好的几块“大英租界”界石砸烂，随后冲向卧龙村东山，围攻山上的英军。英军开枪打死周家屯农民 2 人 群众见状 怒不可遏 迅速冲上山 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搏斗。乘轿陪同英军勘界的登州道台李希杰被愤怒的群众砸烂轿子，打翻在地。文登知县陈景星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英军见状，不敢恋战，趁机逃走。中英合勘界务一时停顿。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使英国政府和清政府都极为震惊。清政府曾提出“暂缓勘办”的主张，当即遭到英方的拒绝。在英国政府的威胁逼迫下，清政府顺从英国“会同续勘”的要求，在英国侵略军和清军的共同镇压威逼下，群众性的抗英最终失败了，1901 年春，英国完成了勘界埋桩。

二、辛亥革命在文登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日本东京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文登籍留日学生丛琯珠、丛琦珠、丛环珠、于春暄等相继回到文登。丛琯珠回文登后，发展同盟会员 100 多人，并形成了以丛琯珠、林基逵、李文澜、丛琦珠等为首的领导核心。1912 年 1 月 18 日夜 丛琯珠率同盟会员突入文登县署，驱逐了清政府最后一任文登知事岳宝树 1 月 19 日成立了文登县革命军政府，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在文登的统治。清旧官吏吕正思、王嘉禾不甘心失败，积极策划复辟活动。他们勾结地主武装向革命党人疯狂反扑，于 2 月 7 日包围了文登城。在斗争中，丛琯珠、林基逵、李文澜、丛琦珠、毕仲海等革命党

人惨遭杀害，革命军政府只存在 20 多天就被反动武装残酷地绞杀了。在这场革命中有 59 人殉难。

三、人民群众抗税斗争

1916 年 10 月，渔盐民协会发动沿海渔盐民 7000 多人，发起反抗渔盐苛税斗争，军警枪杀群众 7 人，激起人民的更大愤怒，抗税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他们捣毁了靖海、港南等渔盐税所，捆绑了税务分局局长狄钟武。1917 年春，胶东镇守使张怀斌，派九十三团一营进驻文登，镇压群众抗税斗争，枪杀群众 30 多人。1930 年，汪疇附近农民千余人，发起抗捐抗税斗争，捣毁汪疇屠宰税卡。1931 年，姚山头、五垒岛渔民姚大有、李庆序等组织渔民联合会，反抗渔盐杂税，声势浩大，打死征收人员，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了姚、李二人，将其杀害于文登城。

文登人民不间断的反抗斗争，显示了广大人民为了摆脱压迫和剥削，寻求翻身解放的斗争精神和力量。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作领导，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指导，斗争都是分散的自发的，没有形成有领导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再加上反动的统治阶级过于强大，文登人民历次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艰苦的斗争中，文登人民渴望自由和光明，渴望已经诞生的共产党的到来。

第二章 中共文登地方组织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一节 中共文登第一个小组的建立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胶东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也积极响应，深入街道、工厂、农村进行爱国宣传，参加各界群众举行的示威游行，举行罢课斗争，会同商界查抵日货。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先进青年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以爱国救国、改造社会为己任，纷纷走出国门、家门，重新探索中国发展的前途。五四运动后，文登的于瓯江、王翼之、宋澄等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背井离乡去寻求真理。

宋澄，原名宋锡奎，又名宋文山，1911年出生于文登县黄山村（现属荣成市）。1930年，在烟台八中求学深造的宋澄，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宋澄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文登县。他凭借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潜伏于国民党文登县党务整理委员会，以组训干事的职务为掩护，深入到学校、农村、邮局等处，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是年秋，上海、北平、济南

等地学生，群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学生请愿的怒潮席卷全国。文登中学（简称文中）的学生和教职员，同全国爱国同胞一样，义愤填膺。他们举行抗日讲演会，无情地揭露和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宣传抵制日货，动员群众抗日救亡。代表文中革命师生新思想的刊物《喉鸿》也锋芒初露，将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12月25日晚，文中进步学生江先政、毕庶恩、牛书斋等秘密决定，在全城张贴一次标语，以唤起民众，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国民党县党部院内、县政府大堂、警察局门口和北宫等几条主要街道都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第二天天刚亮，整个文登城便轰动起来，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文中学生则惊喜地奔走相告“街上有共产党的标语啦！”、“共产党来啦！”……文登县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警察局则一片惊慌，他们派人满街冲刷标语，这就是轰动山城的“红帖事件”。

经过不断的深入了解，宋澄发现文中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大多家境贫寒，他们不但有强烈的求知欲，更有淳朴的正义感，文中师生的正义斗争一直比较活跃。于是他决定首先以文中为突破口，发展党的组织。“红帖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恼羞成怒，派人四下侦察“不法分子”。宋澄以国民党县党部侦察员的身份到文中搜查。他通过进步教师钟平山，得悉了几个贴标语的学生的情况，巧妙地暗中保护他们。在斗争中，宋澄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他以这些青年为骨干在文中成立了进步组织“三一学社”（也称“三一读书会”）其宗旨是信仰共产主义，干共产党主张的事，主要成员有江先政、牛书斋、毕庶恩、盛福东、原道炳（原振忠）、丛树甸、张童华等。是年底，宋澄先后发展了在齐虎山（原为文登五区，现属荣成市）小学任教的王本贤和文中学生江先政为中共党员，并在文中秘密建立了中共文登县第一个小组，宋澄任组长。自此，“三一学社”的成员开始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党的活动和从事党的工作，文中师生的革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文中党组织建立后，党领导文中师生同文登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2年春，国民党文登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胡建民去济南省党部报告：文中有共产党的组织，“打倒国民党”等标语是文中学生贴的，并诬告文中校长王远锋（国民党员）养花玩鸟，不理校政。文中党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研究了应急措施，决定利用文中校长王远锋与胡建民的内部矛盾，以文中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动一次反对胡建民的斗争。首先，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揭露了胡建民到济南诬告文中，陷害学生的罪行。尔后，群情激愤的学生列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胡建民”的口号，直抵县党部，将胡建民揪回文中礼堂进行质问，在学生们愤怒的口号声、质问声中，胡建民无言以对，吓得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文中学生取得了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初步胜利。不久，胡建民、王远锋被迫调离文登，国民党文登县党务整理委员会也一度瘫痪。

第二节 中共文登特支和七乡师 党支部的建立

1932年2月，中共党员于云亭（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偕夫人汤成久（中共党员），受国民党省教育厅的委派，由省城济南来文登筹建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简称七乡师），并担任校长。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于云亭要借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于云亭到任后，马上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通过好友钟平山了解了“三一读书会”的情况，在宋澄的安排下，于云亭很快通过文中自治会主席原道炳召集“三一读书会”的会员在西关小学见了面。他号召学生要将组织发扬广大，肩负起历史重任，接受党的考验，下定决心，向革命方向前进。1932年春季，中共北方局调宋澄到北平西城区门头沟煤矿开展工运工作，中共文登党的组织交王本贤负责。在宋澄离文去北平以后，“三一读书会”的工作便由于云亭来

领导。

1932年4月，于云亭与江先政等商定成立中共文登特别支部（简称文登特支）下旬在文登乡师筹备处，于云亭、江先政、汤成久等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文登特别支部（又称文登临时支部），江先政任书记（后于云亭任书记，江先政任组织委员），于云亭、汤成久分别任组、宣委员。江先政负责农村党的组织发展，于、汤负责七乡师和文中等学校党的工作。文登特支成立后，马上向省委作了汇报。不久，中共山东省委调于云亭到济南训练，时间一个星期，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和组织活动等。回来后，在特支会议上作了传达并作了两项规定：（一）抓紧进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二）在七乡师第一批学生中招收一批共产党员作骨干，以读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是年暑假，文登乡师招收第一批学生，在1000多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80名，其中有文登党组织安排的王本贤、张董华、荣成党组织安排的刘家诤（谷牧）、丛烈光（丛培墜）、邢礼文等中共党员进入七乡师，以读书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

1932年8月，七乡师正式开学。9月，成立了七乡师第一届党支部，谷牧任书记，丛烈光任组织委员，邢礼文任宣传委员。乡师党支部成立后，实际上行使了对文、荣、威党的工作的领导，文登特支也逐渐为七乡师党支部所取代。

乡师党组织建立后，便把七乡师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革命力量的摇篮，七乡师在当时一度被誉为“红七师”。为了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乡师党组织将国民党政府给学生规定的《公民》课改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还经常进行形势教育，主要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行径。为了壮大党的力量，乡师党支部还先后在校内师生当中建立了“反帝大同盟”、“新文艺研究会”、“史地研究会”、“新科学研究会”和“互济会”等进步组织。这些进步组织与党支部血肉相联，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党通过它们广泛地组织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行径的活动。到1933年，乡

师师生大部分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进步组织，对于其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党组织慎重积极地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先后发展了李琴吾、王一平（王炳真）、刘德贤、刘其人等 30 多名党员。

1933 年 5 月，中共党员于洲（于醒夫）应聘从海阳县来到七乡师，以总务处庶务员为掩护，担任中共胶东特委与中共北方局的交通工作，并担任教职工党小组长，七乡师党的领导更加强了。

七乡师党组织一经建立，就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号召，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号召，利用周末课外活动，到附近农村组织“农友会”，建立“农民俱乐部”，同广大农民广交朋友。他们组织了十多所简易小学和农民夜校，由乡师的进步学生轮流任教，一面教文化知识，一面向农民群众宣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并同农民朋友共同演出了《娜拉走后怎样》、《卖火柴的女儿》、《东关私塾》、《渔光曲》等戏剧。为了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谷牧和李琴吾还分别主编了《火线下》和《教师之友》两个刊物，其主要内容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宣传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伸张正义。这两个刊物，通过乡师的两处附小（棋盘山和黄泥庵），印刷并投寄到胶东各地。

1933 年“五一”节前夕，乡师党组织印制了《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和一些标语，派人沿牟平县的上庄到荣成县的斥山公路广为散发张贴，同时，还通过威海中学党小组在威海卫城区内散发张贴。这次行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教育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正当七乡师的活动蓬勃开展和党的组织不断壮大时，学生党员张童华泄露了党的秘密。乡师党组织得知后，立即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决定由党组织出钱安排他到外地读书。张童华获悉后，心怀不满，并写信对于云亭等党内同志进行恫吓。1933 年寒假，党组织以“品行不端”开除了张童华的学籍和党籍。1934 年春，张童华跑到威海卫特区国民党党部，通过党部书记长胡建民，向国民党省党部密报于云亭、于荣瑞、谷牧三人是中共党员。国民党省党部当即命令文

登、牟平、威海卫的警察联合行动，到七乡师捕人。校长于云亭和党支部宣传委员于荣瑞被捕，谷牧因事前离开学校而幸免。中共文登特支和七乡师党支部遂遭破坏。随后，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又组建了新的党支部，于洲任书记，王一平任组织委员，张学礼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七乡师党组织成立了“营救校长委员会”，发动师生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校长。党组织还把张童华写给于云亭的恫吓信（摄成照片）附在请愿书上，派非党员进步学生赴济南“申诉”。当时，因查无实据，加上国民党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出面保释，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宣布无罪释放了于云亭。于荣瑞也在文登城监狱获释。

1934年7月，于云亭被迫辞去校长职务，离开七乡师。学校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等领导也相继离去。已暴露身份的党员也相继转移。暑假开学后，胶东特委指示成立了新的党支部，王一平任书记，张学礼任组织委员，孙华之任宣传委员，继续在七乡师开展革命活动。

第三节 党组织在农村的发展

1931年底中共文登第一个小组诞生和1932年4月中共文登特支建立后，党的火种便以文登中学和七乡师为中心秘密向四周农村播撒。1932年上半年，文登特支书记江先政以教学为掩护，深入农村在家乡四区大致包括现今宋村镇以东的侯家、泽库、埠口、高村、张家产、口子等镇）和教学所在地五区（现今荣成市的黄山、靖海、人和、邱家等镇）郭家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先后介绍了小洛村的蒋淑玉等人入党，并于当年建立了小洛村党小组。党的活动自此在农村蓬勃开展起来。

在党秘密活动时期，由于敌人在各区统治力量有强有弱和地理环境差异等诸多因素，党组织在农村发展的时间、速度和规模不一。其中远离县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昆嵛山、天福山一带党的活动较

早，发展较快。这一带的一、二、三区在 30 年代初曾被党内同志誉为“小苏区”。

一、二区区委的建立

二区位于文登的西北部（包括现今的界石、汪疃、初村、晒字等），地处昆嵛山的东北麓。二区腹地广大，地势复杂，且地处文（登）牟（平）两县结合部，多为远离县城的深山僻壤，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这里，便于秘密活动的进行，利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为了开辟文登西部地区党的工作，经组织安排，曹云章于 1932 年上半年转到二区鞠家庄小学任教，借此开展党的活动。在此期间，曹云章观察了解到二区农民协会干事刘振民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经常领导协会会员进行抗捐抗税，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坚持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曹云章遂于 1932 年 7 月首先介绍刘振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振民入党后，便以卖文具的职业和农民协会宣传干事的公开身份，四处活动，广泛结交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介绍农民协会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到年底，他先后介绍了界石村的刘敬仙、鞠家庄的孙玉明、倪家产村的于绍先、烂木沟的夏振恒、蒿垵村的张元刚和张元信、赵家庄的赵洪宾、英武村的马焕章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在牟平县官上冯家教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连珠也在二区发展了部分党员。

到 1933 年初，党的种子撒遍二区，二区党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着，先后建立了倪家产、崮头集、界石镇三个党支部，还有场东、西院下、烂木沟、大产、阎家泊子、南截山、石头河、蒿垵等党小组，共有党员 40 余名。是年春，为了加强领导，胶东特委指示成立了二区区委，刘振民任书记，王仕仁、丛桂滋任委员，区委下辖 8 个支部。自此，昆嵛山一带党组织迅速发展。

二、三区委的建立

三区位于文登的西南部（包括现今的铺集、宋村西部和米山、泽头、小观等镇的一部分），地处昆嵛山南麓至爬山口一带。

1933 年春，在牟平南乡入党的张连珠奉上级指示，回到家乡三区，以教学为掩护，宣传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同时，他还与刘经三及省委派来的老马，在林子西村开了一个杂货铺，以卖书籍、文具为名，深入四乡开展党的活动。在林子西村张连珠首先发展了邹恒禄入党，邹恒禄则以石匠的职业为掩护深入各村发展党组织，他先后介绍了林子西村的吕式山、邹恒德、于同芝，李家庄的鞠文彬、鞠文海、鞠培基等人入党。至年末，该区西北部林子西、李家庄、周家埠、中汪疃、背眼、西窑、南于疃等村都有了党的种子，党组织在这一带迅速发展壮大，并建立了林子西、李家庄、周家埠 3 个党支部。

1933 年冬，在文登中学入党的杨岫庭（三区杨家疃）回家，首先发展了本村的杨振卿和硝滩村的宋旭春入党，三区东部的党组织也逐步有了发展。

1934 年 4 月，三区区委成立。吕和序任书记，鞠文彬、丛振东、杨岫庭任委员。是年冬，东部党组织发展很快，建立了岛集、硝滩、东孔格庄、郭家店子 4 个党支部。在与胶东特委取得联系后，三区东、西两地党组织联成一片。这时，三区委下辖 7 个党支部，有近 40 余名党员。

三、一区委的建立

一区位于文登的东北部（包括现今的文登营、天福山、大水泊、草庙子、苟山、文城、北郊镇东部）北接威海，东邻荣成。该区东部边沿有昆嵛山的余脉正棋山、天福山横亘三县（市）交界处。

1932 年下半年，党组织安排江先政转到一区友山庵县立四小任教员，开展党的工作。他先后介绍了西字城村的刘中华、碑口村的刘荣昌、后驾山村的于荣华等人入党。刘中华又发展了本村的刘其章入党。同时，曹云章在家乡一区介绍沟道头村的张廷远入党。到 1933 年底，在一区东部和西北部分别建立了西字城、沟道头两个支部。

1934 年 4 月，于荣瑞在文登监狱被释放后，回到家乡一区的驾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首先介绍了在沟于家村教学的王台入党，王台又介绍了该村学董张修己入党。王台、张修己等在驾山、草场庵、沟于家、西字城、岳家口一带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是年 11 月中旬，奉胶东特委指示，成立了沟于家党支部，王台任书记，张修己任组织委员，张修煜任宣传委员。

1935 年 4 月，胶东特委决定将沟于家党支部转为一区区委，王台任书记，张修己、张修煜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1935 年 8 月，中共文登五区区委建立。这样，文登的 5 个区除四区由于党的组织发展过于分散外，其他 4 个区全部建立了区委，党的种子遍撒全县农村各地，党的工作深深地扎根农村大众。党组织在农村的深入发展，为以后党组织发动“一一四”暴动、昆崙山红军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及天福山起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力量，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四节 中共胶东特委和中共文登县委的建立

随着党的队伍迅速发展，1931 年 2 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成立胶东特委，领导整顿所属各县的工作。1932 年 2 月，张静源（张守安、舒实夫，外号张大牙）受省委委托，从莱阳来到牟海边区，筹建胶东特委。他首先与海阳的宋竹庭、牟平的刘经三接上关系，并选择敌人统治薄弱的牟海交界的霄龙寺，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霄

龙寺鸡鸭公司，指定刘经三任经理。鸡鸭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印制和保存党的机密文件；密藏和转运枪支、弹药；与胶东各地党组织联络，了解情况，检查部署工作等。

1933年3月，根据山东临时省委的指示，在张静源的主持下，在昆嵛山区的刘伶庄村（现属乳山市）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张静源任书记，刘经三、刘松山（于寿康）任委员。特委辖莱阳、牟平、海阳、招远、文登、荣成、栖霞、蓬莱、黄县、福山等县党组织。从此，胶东地区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党的工作更加活跃。

7月，山东省委遭破坏后，胶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为了取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特委书记张静源去天津与中央驻北方代表接上关系。根据北方代表的指示，张静源回到莱阳县，在水口村主持成立了中共莱阳中心县委，张静源任书记，领导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福山、蓬莱、招远等县党的工作，使胶东各县党的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尤以莱阳、文登两县最为突出。

在斗争实践中，胶东党组织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心逐步壮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特委书记张静源动员党员买枪、募枪，收集散留民间的枪支。特委规定领导人配备短枪，学习军事知识，指定特委委员刘经三兼管军事工作，并派人到外地学习游击战争经验。此时，混进党内的破坏分子徐元义为了争权夺利，擅自与青岛市委挂钩，蒙骗青岛市委，另立莱阳县委，公开与莱阳中心县委对抗。张静源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统一，曾多次对徐元义进行教育和批评。9月末，张静源去徐元义家做工作，却被其杀害。

张静源遇害后，胶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此时，敌人加紧了对党组织的破坏，不少党员遭到逮捕，有的意志薄弱者脱离了组织。在这严峻的时刻，经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奔走联络，11月中旬，胶东特委在文登省立第七乡师召开了文登、荣成、牟平、海阳、莱阳、栖霞、招远7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文登的王本贤、荣成的丛烈光、牟平的刘经三、海阳的刘松山、莱阳的王之风、招远的王德庵、栖霞的大老牟。会议决定凡是没有成立县委的县，马

上成立县委；刘经三到天津、北平寻找上级党组织。

1933年12月，刘经三在北平找到王心一，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他全面汇报了胶东党的工作情况及面临的困难，提出请北方代表派人到胶东领导党的工作。1934年1月，北方局派常子健（陕西米脂县人，又名常学恭，化名韩春林）随刘经三来到胶东，整顿党的组织。2月，在文登三区林子西村建立了以常子健为书记的中共胶东特委，刘经三任宣传委员，张连珠任组织委员，委员有李厚生、刘松山、宋竹庭、邹青言（又名邹恒禄、俞可范）、刘振民等。特委隶属北方代表领导。胶东特委建立后，一面领导各县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一面在昆嵛山区组建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

根据7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精神，1934年3月，中共文登县委在七乡师成立。曹云章任书记，丛烈光任组织委员，王本贤任宣传委员，隶属中共胶东特委。是年5月，曹云章奉命调特委工作，文登党的工作由特委兼管。10月，特委指示重建文登县委，杨岫庭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兼任委员。

1934年9月23日，特委委员张连珠、刘经三、李厚生奉特委指示赴荣成、威海一带巡视工作。行至文登县崮头集宿店时，因刘经三随身携带的共产国际来信（关于组织问题）被查店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搜出而被捕。解往济南后，韩复榘审问时，3人佯言宿店相遇，原来并不认识。结果张连珠、李厚生2人具保释放，刘经三被解送反省院。随后，特委书记常子健因叛徒向地方反动当局告密，被迫离开胶东去青岛，中共胶东特委遂告解体。

张连珠、李厚生在济南获释后，立即找到代行中共山东省委职权的共青团山东省工委，根据团省工委的指示，回到胶东，于1935年1月在文登二区重新组建了以张连珠为书记的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有刘振民、邹恒禄、曹云章等。特委成立后，在失去省委领导的情况下，按照1934年8月15日共青团山东省工委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压迫，组织抗捐抗税斗争，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